

教授终身制：是激励，也是压力

□本报记者 陆琦



许思麒 / 制图

《上海教育人才“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日前发布，提出将建设高水平教育人才队伍。其中，建立在学科(专业)末位淘汰制基础上的教授终身制被提上日程。

几年前，高校在教师履职考核上，教授“一评定终身”的惯例被修改，从打破教授终身制到建立在学科(专业)末位淘汰制基础上的教授终身制，此次改革是不是回到了“老路”？

不是“职称终身制”

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强调，首先要把“终身制”的内涵搞清楚。

“教授终身制”是美国大学的三大基石之一，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和自由，而在我国大学备受诟病的实际上是“职称终身制”，即所谓的教授“一评定终身”。

“教授终身制”能够使一部分优秀教授具有更大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激励机制。”顾海良说，“当然，学校对终身教授也是有要求的，必须自觉地达到一定学术水平，并负责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上海教育人才“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在学科(专业)末位淘汰制基础上的教授终身制，对经过严格考核而最终得以晋升的教授授予终身教职，不再进行严格的任期考核，使其潜心学术，免受外界干扰。辅以学科(专业)末位淘汰机制，凡是排名持续垫底的学科专业将被调整，以确保高校所有学科专业的进步。

“这样的提法和2003年北大提出的人事改革方案非常相似。”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告诉记者，当时北大人事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施行教授终身制，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等。

包万平认为，提出“建立学科(专业)末位淘汰制基础上的教授终身制”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竞争和淘汰机制，选拔优秀人才，铲除平庸之辈，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这是一个良好的祝愿，最终能否实现，现在还不好说。”

让教授潜心学术

促使现在重提“教授终身制”的原因很多。比如，大学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承担着失败的风险，在追求效率、追求数量的背景下难以出现高水平的成果；目前大学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近亲繁殖、学术腐败、行政化等积重难返，无法通过教师聘任制获得彻底解决；大学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等等。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不得

不重提‘教授终身制’，以还原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排除一切不利因素，保障教师的教学、科研、服务等。”包万平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推行教师聘任制，但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再加上政府有关部门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和市场经济的冲击，现在高校教师聘任制已经严重走形。包万平甚至认为，我国高校实施的聘任制，是把计划体制下的终身制改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续聘制、考核制、分级制等，最终又回到半市场半计划下的终身制。

“我们实施的聘任制，很难把那些不合格的教师逐出教师队伍，也无法避免多数人的碌碌无为。同时，我们的教师聘任制缺乏被西方社会特别看重的契约精神、公平正义、权利义务等核心要素。”包万平说。

顾海良则表示，教师聘任虽然打破了终身制，但对一些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产生了副作用。“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没有连贯性，无法开展重大研究项目。”

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就已开始在校内推出“终身教授聘任制”，就是让教师能静下心来，在原创性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据悉，受聘为华师大终身教授的条件相当苛刻，必须是治学态度严谨、职业道德素质高，在本研究领域有相当的学术造诣、在本学科的发展和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学术带头人，满足了这些条件，无论年龄大小，都有机会。

避免出现南郭先生

既然企业里的“铁饭碗”会养懒汉，“教授终身制”会不会制造校园混日子？专家们普遍表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评上教

授后，“船到码头车到站”，干活热情降低、混日子的人肯定会存在，因此要完善制度，尽量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

为了避免南郭先生的出现，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美国大学会对一个申请人进行为期六七年考察，这六七年属于潜能测试期，大学会通过各种方式考察申请人有没有成为著名教授的可能。申请人如果在这六七年里面表现不佳，那就只能“滚蛋”了，美国大学没有养闲人的习惯，而通过近乎绝情的tenure track(可授予终身职位的聘雇制度)考验才有可能留下来。

“一般经过浴血奋战，突破重重关卡，获得终身教授的人是不会堕落的，因为他们都

清楚，在获取教授职位的道路上他们一路炼狱，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也练就了当好教授的硬功夫。”包万平表示，这就大大降低了出现南郭先生的概率。

“尽管有一套又一套的条条框框的严格考核，也避免不了有一些南郭先生仍会混进来，这就得靠后面的评估制度，如校内同行评价、校外同行评价、学生评价、校方评价等。”包万平说，“这些制度可能砸不了南郭先生的‘饭碗’，但足以让他痛苦和难受，这样他就会很自然地好好干了。”

据了解，日本的大学教授也要每隔几年接受一次“业务审查”，以保证教授能够积极上进，而不是评上教授就万事大吉了。

链接

教授终身制最初来自德国大学，后来在美国也开始实行。

19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有个叫爱德华·罗斯的社会学教授，观点激进，主张铁路应当国有，不该由私营企业把持。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是靠勒兰德·斯坦福捐助办起来的，而这位大亨家靠的正是建设铁路。当时，勒兰德·斯坦福的遗嘱还担任着校董会的董事长。这场风波的结果自然是罗斯丢了饭碗。

“罗斯事件”让美国人明白，即便在美国那样标榜思想自由的社会里，政治权力也罢，经济权力也罢，是会威胁学术的。于是，这场风波衍生出另一个结果：美国高校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建立教授终身制，以保证学术不受政客、企业家和捐助人的干扰。

1994年，美国国会在《反雇佣年龄歧

视法案》中又加上了新的条款，规定学校不得强迫终身教授退休。教授的位置又得到了另一重保障。

美国大学推行教授终身制的重要价值也是，给获得终身教职的人解决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免受学术以外的力量干扰。保障教授终身执教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者有言论自由。如果教授的研究或者言论出现了和政治当局严重的对立或者不一致，或者教授表达了多么不能让人容忍的观点时，学校都要保障教授终身执教的权力，而不能解聘教授。第二，除非不胜职守和道德败坏，教授职位必须得到保证生计应有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的保障。第三，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

微言大学

@朱永新V: 考试改革势在必行。前不久参加了由公众学业素质研究中心等主办的ACTS中国校园素质能力竞赛的颁奖典礼，很有感触。这是一项由民间发起的评价与考试改革，参加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仅有原始分(卷面成绩)，而且有百分分(参加考试的人数排列)和标准分(同龄人中的数位)，这比我们的高考只看卷面分数合理。

@熊丙奇V: 我国内地本就没有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所以，这些“大学”里的人和事，都给人似是而非之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教授，成为纠缠不清的概念。教育和学术要走出这种困境，还得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让大学真正成为大学。

@冯小刚V: 中国的美术学院招研究生，往往画画好的天才因为英语不好而落选。英语好的往往专业很平庸。英语成了封杀天才的凶器。陈丹青为天才考生奔走疾呼无果，继而愤怒辞去教授差事。真不明白招的是画画的还是学英语的？您办的又不是中央美术翻译学院。为什么人家美国的美术学院招生不用英语？

@大学生生活V: [你正在#学什么#而你#想学什么#呢]如果不学新闻，我想做个理发师；如果不学生物，我想当个赛车手；如果不学金融，我想做个心理咨询师；如果不学医，我想做个流浪诗人……”人人网上袁琳同学的一条状态引来近4万网友转发，大家用各样语言，诉说自己专业和梦想之间的差距，中国教育这些年的成果？或许这就是回答。

@美国大学网V: 哈佛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基本上呈逐年递增趋势。2005~2010年的人数分别为：378、403、400、421、463、541人。(据哈佛大学网站)

@止庵V: 好的文章不一定好看，反之亦然。有发表好文章的，有发表好看的文章的，这不就平衡了。

@严锋V: 如何判断社科学术成就？一篇有100个注，全是抄；一篇没注，但有原创思想，哪个高？一人有100篇文章，全是垃圾；另一个只有1篇，但是能留下来，哪个好？最好办法是同行评议，匿名评审，这也是国际社科界的通行做法。最坏的就是我们的搞量化，定指标，数篇数。

@友成汤敏V: 中外教育差异之一斑。考滑铁卢之战。我试题：该役，何时、何地、谁人打、结果如何、胜败何因、意义何在？法国一校考题：如拿破仑滑铁卢未败，问，今欧洲格局如何？

@王立群V: 大学之大，不在城大，不在楼高，不在喧嚣；在于大师，在于文化，在于底蕴。大学的经历，不是单纯的知识累积，而是一份向大师靠拢的内驱力。

@钱晓芳V: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并非最早出现的大学，它们之所以能在欧洲众多的古典大学中彪炳史册，就在于较早地突破了宗教的束缚，以“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为办学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两校开创了基础研究、学院制、导师制等，培养了大批世界级大师人才，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腾讯微博)

(本期栏目内容除标注外选自新浪微博)

政策通道

教育部要求高校设基金平抑食堂饭菜价格

第二届全国“农校对接”洽谈会暨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日前在济南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参观了“农校对接”洽谈会的企业展示，并听取了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代表的发言。鲁昕表示，秋季开学在即，各地各高校要把稳定食堂饭菜价格当做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下大力气抓紧抓好。

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形势下，近两个月来，食品类价格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鲁昕说，根据目前形势，未来一段时期市场物价仍将在高位运行，学生食堂运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将在秋季开学前下发。

鲁昕希望，各地进一步加大对学生食堂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力度。各地要对学校教学和师生生活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分别按居民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执行；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食堂为学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同时，各高校要统筹财政拨款、学费及其他收入等资金渠道，根据在校生数，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资金，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根据价格上涨情况，适时对学生食堂基本大伙(包括社会企业经营的食堂)进行补贴，抑制饭菜价格过快上涨。

鲁昕指出，要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校食堂运行机制，在保证公益性投入的基础上，采取市场运作机制是有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将学生食堂推向市场。各地各高校要稳步开放校内餐饮服务市场，引入优质企业，同时加强监管，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她要求各地、各高校要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临时补贴或提高资助标准。

鲁昕希望学校的党政一把手一定要亲自抓好学生食堂的价格稳定和学生的思想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及时化解和排除可能影响学校稳定的各种因素。(据教育部网)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改革需要怎样的舆论支持

□尤小立

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受困于现实的羁绊。有媒体采访校长朱清时后，用了一个“朱清时：期待媒体‘拯救’南科大”的标题进行报道。也许这名记者是个典型的“标题党”，因为报道中并没有出现朱清时校长谈“拯救”的段落。当然，这次没有讲，并不等于没有期待过。据朱校长自己讲，他筹建南科大前的“高调”姿态，就是希望媒体能够给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为改革减少阻力。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朱校长原来的愿望如今成了困扰自己的问题，媒体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肯定让他本人措手不及。

其实，媒体以前的鼓吹和近来的倒戈是有理由的。简言之，以前是过于理想地期待，以后又是过于悲观地想象。但这一切的起因都与他们对大学现状太过隔膜有关。

媒体与大学之间的隔膜，原因很多，首先与媒体过多地关注“宣传”有关。现如今，媒体上关于大学的报道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算是教育新闻的一大主题。但这些报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大学自

身，属于自我宣传，因而夸张和放大优点的趋势就愈演愈烈，甚至于煽动而不自知。比如有一所大学报道说，他们学校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不知道，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特别是国务院下令高铁降速之后，这所大学的发展是否也准备降速？

如果大学自身的宣传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大学充满向往之时，可能还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现如今大学的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并且大学教育正在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过度的夸张宣传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一旦大学出了偶然的事件，也会当被做必然的事件来理解。同样，一旦理想为现实所限而未能达至理想结果时，便会失望，进而加以质疑。

媒体对南科大报道前后的反差如此之大，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在南科大筹建时期，朱清时校长使出浑身解数，公关动员，从而让南科大的创办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大多数热衷于报道南科大的媒体其实并不了解当下中国大学真

的现状和改革的方向。他们怀揣社会责任感和对于大学改革的期望参与到南科大的报道中，当然是希望有个实质性的(如“去行政化”)转变的。但当下中国大学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结果，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成了一场理想的游戏，却以反戈一击的悲剧方式收场。

吊诡的是，大学以外的人们了解大学，不是依靠自身的观察而是通过大学借助媒体进行的身自宣传来获得。大学中的现实主义者，拿出许多这样、那样的数据，证明自己的工作成绩，用数据来勾勒大学的未来、方向和“理想”，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永远就是那么一点，但却可以变着花样出现。这就是饱受外界批评的大学诸如量化管理、课题至上等政策丝毫无损、我行我素的原因。

在学术共同体尚无构建可能的情况下，大学真正的问题既不会引起校内人员的关注，也不可能为校外的媒体所探知。但大学却已经养成了一种眼中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接受习惯。大学改革不仅永远是少数人的权力作用，而且永

远只能是行政性的。这样一来，南科大朱清时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在“次行政化”之下延续了。

大学改革不能缺乏舆论的支持，同时也不能缺乏舆论的监督。媒体的批评既是支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监督的一部分。但这里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媒体要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可能和权利。就大学而言，如果要想媒体的支持和监督落到实处，大学本身必须具有开放的精神，其政策需要有相当的透明度；大学的各级领导者，乃至教师都应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换言之，大学应该逐渐从行政性傲慢中走出来，代之以虚怀若谷的谦卑之心，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信满满，舍我其谁。这样，大学才可能逐渐摆脱行政指标催逼下的“高铁速度”，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轨道，并且才可能重拾曾经拥有的教育功能，重建曾经具备的社会威望。这句话，只有敢于面对批评，大学和媒体之间才可能形成彼此互动、合作共赢的良好生态。